被总统马克龙点赞的法国艺术家，写书记录自己的中国生活：

年轻人敢于梦想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在北京和上海
展开一场对平衡与意义的无声追寻

来中国前，我在法国做了 20 年老师。我感觉自己在巴黎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这对于艺术创作来说不是最理想的状态。

于是在 2015 年，我离开了巴黎，也告别了那里的快节奏、熟悉的都市喧嚣声和多变的气候，搬到这个广阔而处处充满对比的国度，搬到了它的首都北京。

由此，我正式开启了一段新的内心旅程，一场对平衡与意义的无声追寻，这种追寻源于我对身边那些中国朋友们的兴趣。

这段旅程引导我去思考幸福：幸福藏在哪里？我们如何辨识它？这些具有普适意义的问题，伴随着我日渐融入了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人文环境。

上海是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永远在变化，而我需要改变。于是，2020 年，在北京生活了五年之后，我搬来了上海。

作为一名艺术家，最让我着迷的永远是发现人性的真相，并且努力去捕捉它。这毫无疑问就是我被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吸引的原因：这两座城市都以自己的方式，展现着这种真相的一个立面。

北京是座千年古城，深邃得近乎神秘。它时刻讲述着一个充满怀旧气息的老故事，对我来说，它就是巨龙的心脏。上海则年轻得多，作为 20 世纪初叶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个地方，它的城市基因里烙印着求新求变，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的特点。它充满活力，闪耀得像一道瀑布；而北京更像是条平静流淌的小溪，沉稳而深思熟虑。

两座城市，两种气场，两种对人类世界的诠释，我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将它们捕捉下来。

当路易十四遇上康熙
在上海收获太多创作灵感

在上海的五年间，我收获了太多创作灵感。

上海是一座多民族与多文化交融的国际大都市，这种多样性让我更深入理解了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普通人的奉献——正是他们的勇气与远见，赋予了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动力。在探索这些人文故事时，那些建设者的精神深深启发了我，激励我将这些多维度的面貌转化为雕塑创作。

五年来我已完成了七件雕塑作品，每件作品都试图通过不同的角度探索人类的投入和奉献精神。我以历史人物和象征人物为灵感，选用中国产的材质，比如珍贵木材、白玉、景德镇瓷器、不锈钢和青铜等材料，以期让不同文化与历史遗产之间产生对话。

就像我先后完成的两件雕塑《路易十四》和《康熙》：青铜与木材制成的雕塑刻画了路易十四在统治初期的形象。他跪在一块镌刻着太阳图案的基座上，象征其即将成为 “太阳王” 的未来。这位年轻的君主既体现了青春的纯真，也承载着命运的重量。

路易十四与康熙大帝，在遥远的 17 世纪就像分处东西世界的 “两个太阳”。当 “太阳王” 以辉煌的权威统治着法国的同时，清朝最杰出的皇帝之一——康熙，则以睿智与力量治理着中国。

尽管两人相隔万里，他们的统治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权力高度集中、热衷艺术赞助、推动科学发展，并积极扩展自身的影响力。

我如今身在东方，所以在创作中时不时会将中西的人物和文化进行联结，就像我的另一尊雕塑《玛丽安娜的诞生》。通过结合金丝楠木与景德镇瓷器，这件作品在体现启蒙运动的人文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之余，又致敬了千年手工艺传统。

玛丽安娜，法国共和国的象征，代表着自由、平等与博爱。她是人民的声音，是民主的面孔，是以人的尊严为核心的共和人文主义的化身。在创作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另一个人、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的孔子，他奠定了以仁、礼和社会和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

乍一看，象征革命的女性形象与古老东方的圣贤似乎毫无关联。然而，他们却遵循了一条共同的内心道路，即对人性良善的信念，以及深信每一个体为社会贡献正向力量的重要性。

玛丽安娜象征着一个建立在公民权利与责任基础上的社会；而孔子则教导人们，只有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与安定。

两者也都重视教育的力量。共和国将教育视为培养公民精神的支柱，而孔子则认为学习是通向智慧与道德完善之路。在他们的思想中，人不应只是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而应是一个拥有尊严、责任与意义的个体。

因此，玛丽安娜与孔子，虽来自不同文化，却穿越了一条共同的道路，那是一条由理性、正义与相互尊重所引领的光明之路。

那一天，在中国生活了十年的法国艺术家苏善书(Pierre Alivon)决定写一本书。

那是个雨天，他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忘乎所以拍着照片，完全沉浸在雨天校园的诗意氛围里，直到一名学生走近了自己。一言不发地，那个年轻人递来一双干袜子。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鞋子早已湿光，浸透了水的鞋底每走一步就发出令人尴尬的啪嗒声。

这个举动深深触动了他：“没有仪式感，不带任何期待，纯粹发自内心的善意。他淡淡微笑，仿佛这举动理所当然——仿佛关怀他人的思想早已融入自己的身体。”

当天回家，他就决定写一本记录自己中国生活的书。“是时候了，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年。在西方，人们往往通过官方话语体系来看待中国，却很少看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我见到的中国人，其实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们相似，他们的生活也是由简单的快乐，个人的奋斗和真挚的友谊构成的。”苏善书有感而发道，“一个国家，首先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组成的。让人们了解这份普通却珍贵的日常，同时就是在促进更深的理解，架起国与国之间友谊的桥梁。”

于是，他开始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在街头的咖啡馆，任何能摆放一份手稿的地方，缓慢而执着地记录着回忆和现实。八个月后，这本书终于完成。他为其取名《第十三面旗帜》，“17 世纪满洲建立了八旗制度，奠定了清王朝日后强盛的根基。于是我设想了第十三面旗，用来象征那些低调却坚定的中国当代年轻人，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基石。”

以下为苏善书自述：

创作是一场漫长的内在旅程
通过文字展现影像无法言说的部分

创作对于我而言永远是一场漫长的内在旅程。

一切始于一个简单的动作：拿起一张纸，记录下我想表达的情感与感受。接着，我尝试将这些情感与某个形象或人物关联。渐渐地，一种姿态在我脑海中成形，如同自然浮现的记忆。当这种构想清晰后，我会前往位于河北的工作室开始制作。

在创作《玛丽安娜的诞生》期间，我曾两次有幸获得了来自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关注。头一次是在作品的筹备期间，当了解了该项目以及我试图通过作品来象征法中文化纽带的愿景后，他对这次艺术与外交行动表示了鼓励和支持。

后来，当雕塑完成后，我为了向总统当初的鼓励表达谢意，向他赠送了一个 30 厘米高的玉石版本的玛丽安娜。总统收到后亲自回信，对这一作品诚挚致谢，并称赞其完美展现了法国人文主义的价值观。

在长期使用雕塑和摄影的方式进行创作后，我决定诉诸于文字这一最朴素的创作方式。《第十三面旗帜》既是个人叙事，也是一次艺术探索。众所周知，雕塑是具体可触却无声的存在。在这本书，我试图赋予它声音。如同摄影般，我让作品开口诉说，揭示潜藏的创作意图、情感与视角。

它追溯我在中国十年间的发现，以及与中国友人的相遇——他们常被我拍摄于围墙之后、居所的私密空间里。这些我当初用专注与尊重的态度所捕捉的生活碎片，如今将以文字的方式展现影像本身无法言说的部分。

但书中的配图不仅仅是插图，它们是故事的延伸。在捕捉光线、动作与目光的瞬间，它们延续了文字，也唤起想象与情感。

比如有些照片展示了我身穿京剧脸谱面具的中国朋友，这种选择既有审美意义，也具有象征意义，体现了情感的内敛、面具背后的沉默与表演背后的真实。京剧脸谱展现了传统之美，而这种传统依旧在日常生活中延续。

我并不试图通过这本书
去解答关于幸福的问题

正如我所言，《第十三面旗帜》象征着那些低调而坚定的中国青年。我怀着一种真正的敬意看待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这些青年男女以尊严展现出一个正在转型的国家具有的那种沉静的力量。

他们的坚韧、团结以及在困境中依旧敢于梦想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最触动我的是他们将个人生活与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联结的能力。是的，有些年轻人令我印象深刻：他们在日常中展现着勇气，具备集体生活能力，为进步不懈奋斗，同时维系着牢固的家庭纽带。

我发现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家庭高于一切——有时甚至超越自身存在。这种无声的奉献，这种不仅为自己更为家人前进的意愿，深深打动了我。这是一种低调却强大的力量，我试图通过作品去观察、理解并讲述它。

我想在书中讲述我所看到的中国，更重要的是，我所感受到的中国。灵感在一次次重要的邂逅、深厚的友谊、交错的面孔与无声胜有声的沉默中逐渐构建而成。

我内心中的中国是奋进的中国，来自各方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共同推动着这个国家的成长。这里涌动着令人震撼的集体性能量，它由责任感与共同向前的渴望所驱动。

在书中，我探索中国朋友对幸福的理解，并将其与西方观念对比。两种文化中，对于幸福的定义最常见的答案通常是金钱——它能提供舒适生活与基本需求的满足。但超越物质层面，真正的幸福似乎另有归属。

对许多人而言，幸福也存在于人际交往与真诚交流中——这种无形的财富只有通过真挚的接触才能获得。而我的中国朋友还给出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答案：真正的幸福是拥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代表未来、延续与家庭荣耀。

这是个复杂的命题，因为在中国，幸福的概念与 “和谐” 密不可分：家庭和谐、社会和谐、还有自然及周遭力量的和谐。这种理念贯穿于传统医学与孔子思想中，用当代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双脚扎根大地，同时与世界保持平衡。这是种生存智慧，一种日常生活的哲学。

《第十三面旗》无疑是我迄今为止最为私人的作品，它并不试图解答关于幸福的问题，而是通过一种独特的经历去勾勒出幸福的轮廓：

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法国人，直面自己的局限，并逐渐走向一次本质的相遇——与自我的相遇。而也许，通过他人，我们能对人性多一份希望。

文/晨报记者 沈坤彧 丁梦婕 图/受访者提供